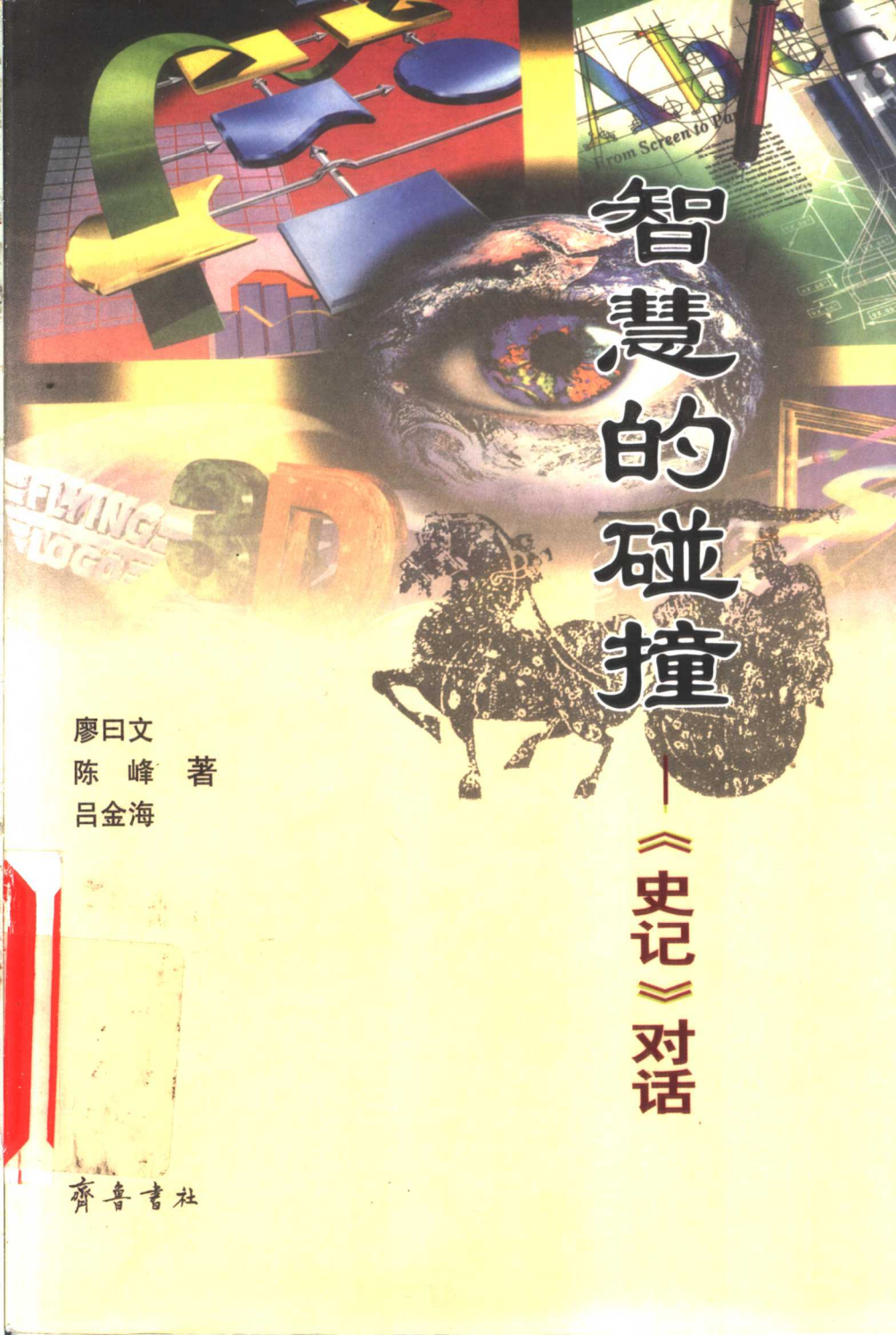




智慧的碰撞

《史记》对话

廖日文
陈峰 著
吕金海

齐鲁书社

智慧的碰撞

——《史记》对话

廖曰文

陈 峰 著

吕金海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智慧的碰撞:《史记》对话/廖曰文,陈峰,吕金海
著. —济南:齐鲁书社, 2001.9
ISBN 7-5333-0993-6

I . 智... II . ①廖...②陈...③吕... III . 史记—
研究 IV .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01) 第 060966 号

智慧的碰撞

——《史记》对话

廖曰文
陈 峰 著
吕金海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9.75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33-0993-6

K·285 定价:19.00 元

序（一）

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将自己的任务视为研究历史，社会有了历史学这个专门的知识分工领域。历史学的研究被规定为搜集、考订、整理历史资料，寻出真确的历史事实，进而探求历史事实之间联系的真理，以至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进一步从理论与历史实际的结合中阐明历史的真象。许多史学家为此付出辛勤的努力，这对于发展历史学确实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专业史学家来说，按照上述规定，对研究历史作出了业绩，得到同行和社会的承认，任务看来也就完成了。再往深处一想，似乎又不尽然了。

以往我们在论及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时，曾经提出历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后来觉得这种理解过于狭窄，又改提为社会主义服务。很难说错，却嫌空泛。实际上历史学是以历史知识影响现实社会中的人而与其它社会领域发生联系的。人类历史固然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历史学家有责任更加全面深透地研究历史，但历史又并非仅仅与历史学家打交道。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产物，都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与历史有着或多或少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位公民。当然，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对于历史与自身关系的认识，有自觉的、朦朦胧胧半自觉的、以至不自觉的区别。让现实社会中的公民自觉地认识到历史与自身及其所从事的事

业的关系,自觉地利用历史资源,作一个自觉的历史创造者,显然极为有益于现实社会的健康发展。当历史学家走出历史学界狭隘的事业圈子,真正地看到历史知识与现实社会其他成员的广泛联系时,在历史学面前便立即展现出极为广阔的天地。让广大的社会公众接受历史知识并起到积极的作用,作为社会分工领域之一的历史学才真正地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职责,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而这也正是历史学真正得到繁荣发展的沃土。

古代一些有识见的史家,也已经看出了历史与现实社会联系这个道理,因此他们在强调真实地记录历史事实的同时,又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但他们的目光主要注视着当时的统治集团,历史成了帝王、王子、后妃、大臣们的教科书,为他们提供调节内部关系统治人民大众的资鉴。近代以来,进步的历史学家们斥责这种“君史”,提倡写“民史”,为人民大众而研究历史。这在历史学,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何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历史的内容,这里不作讨论。即便为人民大众研究历史,也依然存在一个走出历史学的圈子而为人民大众接受的问题。我国不少老一辈史学家,如顾颉刚先生、吴晗先生等,便非常重视向人民大众传播和普及历史知识。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世界历史小丛书》,合起来大约达二百种,许多历史学者为向社会大众传播历史知识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对于他们的这部分辛勤劳动,历史学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和符合实际的高度评价的。

如何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更好地更有效地传播历史知识,今天依然是历史学界亟待积极思考并付诸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向包括青年一代的社会公众传播历史知识,可以说是历史学专业研究工作的继续和延伸。当然,这两者之间

又是有所区别的。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更加关注的是获得历史的真相和真理。非历史专业的社会公众之需要历史知识,更加关心的是历史知识对自己有什么用处。他们不大可能像历史学家对待自己专业那样费精用神,他们有自己的工作或专业,他们宁愿以一种轻松活泼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接受历史的教育和知识。这是我们向社会公众包括青年一代传播历史知识时不得不考虑的实际情况。这就要求我们在传播历史知识时,不仅要有正确的观点,可靠的材料,还要讲求乐于为人接受的表述形式。

人类历史的内容极为丰富。现实中的社会公众有着不同的层次和角色,他们学习和吸取历史的内容和养分也会有所区别。只要设法使人们进入历史世界,历史便会展现为无穷无尽的知识、道德和智慧的宝藏。向包括青年在内的社会公众传播历史知识,根本的宗旨无疑是,采取生动多彩的通俗形式,将理性知识和经验知识渗透融合,深入浅出,使得人们能正确地了解过去,理解现在,洞识未来,确立和增强对祖国前途和人类未来发展的信心,养成乐天努进的人生观。历史当然也有黑暗、卑污、糟粕的一面,了解这些同样也可以帮助人们观察和理解现在,增强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自觉性。历史又是一所培养高尚道德的自修学校。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的言行,闪耀出中华民族和人类美德的光辉和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忠报国”,“仁者爱人”,为民请命,抗击强暴,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言必信,行必果”,“吾日三省吾身”,孝敬父母,笃于友情,孔融让梨,凿壁偷光,等等。见贤思齐,学习前贤的这些嘉言懿行,无疑会增进自己的品格修养,日积月累,逐渐地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所以《周易》便说过:“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历史不仅可以增加人

们的历史知识,增进道德修养,同时还可以极大地开启人们的智慧,锻炼历史读者的才识。套用《周易》的话语形式,也可以表述为,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开其智。智慧通常解释为聪明和才智,在实践中智慧则表现为人们在遇到问题和事情时,能够破除迷惑、求证真理、解决问题的识见和能力。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上许多前人在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事情时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智慧和卓越才华,常常令后世读者击节称赏、叹为观止、茅塞大开。这种开启人们智慧的历史事例,内容同样是极为丰富的。廖曰文等学者的这部著作,对于开掘历史这方面的资源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史学工作者在向社会公众传播历史知识时,无疑可以根据读者对象和自己的所长作出选择。

向青年一代进行历史教育,更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但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此是重视不够的。以大学而言,理工科学生很长一段时间不学历史,只有一点革命史的大课。其结果是我们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的人文知识素质令人惋惜地下降了,这显然影响到他们对社会所能作出的贡献。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的国家教委就历史教育约请一些历史学家开会征求意见时,我曾经提出建议,历史知识和语文知识、数学知识一样,是一个公民文化素质的最基本的构成部分。高等院校不能仅仅历史系才学历史,每一个专业的大学生都应当接受历史知识教育,提高文化素质。这当然不止是我个人的见解,而是一大批历史学者的共识。令人欣慰的是国家教育领导机构后来采纳了这样的建议,在高校学生中普遍地开展了历史教育。廖曰文同志是在工科院校担任历史教学任务的。他从多年的历史教学实践中辛勤探索,根据理工科学生接受历史知识教育的特点,师心独运,在陈峰、吕金海两位学者的协助下,写成了这部《智慧的

碰撞》。本书从我国古典史学名著《史记》中选取 58 则史例,分成治政、财经、军事、言辩、人际五个专题,采取师生对话的生动形式,实际也是历史与现实对话的形式,发掘出历史的智慧资源,从智慧的碰撞中引导学生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兴趣,为对青年一代进行历史教育作出了可贵而有益的尝试。不仅理工科大学学生,每一位对历史有兴趣的读者,都是可以从中得出智慧启迪的。故乐为之序。

蒋大椿

2001 年 7 月 4 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序（二）

人们常说,书是知识与智慧的海洋,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这广袤的海洋中,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与传统,得以传承与升华;更是藉助了这一阶梯,人类社会才得以进步,科学技术方衍化为今日之辉煌。目今,人类刚迈步登入新世纪的殿堂,便有学者对新旧世纪加以回顾与预言称,20 世纪上半叶的主题是战争,下半叶的主题则是经济;而 21 世纪上半叶的主题将是科技,下半叶的主题则是文化。此语之出,事属有因,这表明,人类社会在经过了战争的洗礼、经济的繁荣与科技的昌明之后,其发展趋势必将又回归到文化这一永恒的主题上来了,且以此将具有崭新的内涵与形式的文化,作为推动社会跃上新阶的不竭动力。由此足见,文化的价值,科技的魅力,智慧的闪光,均蕴涵其中了。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恰似一条奔涌向前的长河,历史与传统则是它的源头。离开这个源头,现实不仅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且更缺失了对未来进行开拓创新的能源与动力。然而,历史与传统绝非风干的“木乃伊”,而是仍有着穿越时空隧道,存在某种生命力、穿透力与影响力的鲜活载体。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诸多由先哲们撰著并凝聚了历史文化发展轨迹与智慧的典籍,如以《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等,它们既有参照借鉴的功能作用,又是人们

在现实创业中可以汲取智慧的源泉与宝库。

古往今来,无数生动的事例告诉人们,历史的智慧需要智者去发掘、去升华,而思想的闪光、科学悟性的引爆,更需要人们智慧的撞击。最近,由廖曰文等同志撰写的《智慧的碰撞——〈史记〉对话》一书(以下简称《对话》),就是其生动的例证。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位居二十四史之首,而书中蕴含的智慧与思想、文笔的生动与流畅,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这样一座史学丰碑式的智慧库,如何开启、发掘,并为新世纪的理工、人文科系的大学生提高身心素质教育,提供“‘蜂王浆’式”的养料,还要做到喜闻乐见、听读受益,其本身便具有挑战与开拓性。《对话》这部书不仅做到了这些,而且还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先例,可喜可贺。通观全书,共分“治政篇”、“财经篇”、“军事篇”、“言辩篇”、“人际篇”等五篇,计五十八章对话,引经据典、谈古道今,探究哲理、点化人生、启迪智慧、升华文化;上涉军事、政治、财经智道,下及言辩、人际交往技能,洋洋洒洒,可谓煌煌矣。其特点有:

第一,对文化传统——溯其源,辨其流。

从班固开始,二千多年来对《史记》的研究真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宏纤毕具,但我还未见以这种形式来发掘《史记》这座宝库的。这本书对《史记》中的智慧作了精要的提炼,并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分析这些智慧,这是具有开创性的。它不是单纯地讲述“智谋故事”,而是在消化、吸收《史记》中的智慧的基础上,用较为通俗的形式引导读者进入深层的思考。这种形式,为《史记》这类传统文化名著走进课堂、走进读者心田作了有价值的探索与实践。我们一直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如果没有有效的讲授方法和学习形式,弘扬传统文化也将成为一句

空话。

第二,对古代智慧——剖其思,析其义。

这本书稿的素材来自于工科大学生的作业和课堂讨论。他们以前没有学过《史记》,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也不深,但他们聪明、活泼、敏锐,往往能够从我们不易想到的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充分体现了当代大学生思维敏捷、勇于思考的风采。而教师的点评有理有据,并有意识地介绍了大量相关的人文知识,丰富了书稿的信息量。教师还注意引导学生关注现实,深入思考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使书稿充满着活力。对于书中涉及的一些历史事实,作者作了周详的考证,保证了史料的精确。

第三,对社会人生——悟其道,点其真。

大学阶段是人生旅途中的重要“驿站”,也是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书中通过对话,引导学生们悟社会之道(发展规律)、点人生之真(真谛)。如书中在“治政篇”的《严法惩恶》一文中,作者通过汉代义纵与郅都执法严酷,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故事,与大学生探究社会、国家如何才能“大治”的问题。由此引发出“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关联,明确指出:司马迁不仅反对在特殊情况下的酷法,而且反对滥刑、妄杀;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治理国家主要应该采用德治。同时他不赞同俗儒们将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的迂腐观点,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器,不可缺少。但其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目的。而为政之道,当施以“德治”,才能使天下国泰民安。通过故事,引发对话,对社会人生的“道”、“真”进行点悟,透彻而清晰,自然而贴切,可谓精妙绝伦。

第四,对成长创业——活其用,创其新。

司马迁著史的目的就是“述往事,思来者”,既记录历史的变迁,又为后人提供借鉴。研究历史就是为了现在。这本书稿保

持了史学的这种优良传统,融古于今,以现代的意境阐释古代的智慧,给人以深刻启迪。如对于刘敬兴都关中的计策,它很自然地联系到了当代城市化建设的课题,我觉得很有道理。还有卓氏远迁以致富的故事,它又引申到西部大开发战略,我觉得对广大创业者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借鉴。千百年来,《史记》让人常读常新,如今,这本书又赋予了它更加现实的意义。我认为《史记》作为博大精深的文化巨著,应该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人文精神的动力,使中华民族在全球一体化潮流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性和先进性。

第五,对素质优化——化其智,教其能。

对当代理工科大学生而言,其素质优化可分为三个层面:一为智商(先天),二为智力(后天的学历+阅历),三为智能(即将知识与成果转化为开拓创新的技能)。因此,如何实现转化成为关键的所在,犹如专利如何转化为产品、智力如何转化为智能、知识如何转化为创新等等。而在《对话》一书的“治政篇”、“财经篇”、“军事篇”、“言辩篇”、“人际篇”中,作者通过史实的对话,力求做到化其智,教其能。如从“公仪拒鱼”的故事,引出智能所在:鲁相公仪休拒收客人送的鱼,对话者认为此公能把握“大利”与“小得”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作出理性的抉择。在化其“智”后,更引伸教其“能”——即为人处世要眼光长远,不能鼠目寸光,只局限于眼前利益。正如公仪休所说的“如果因为今天收下你的鱼而被免官,今后谁还肯给我送鱼?”如果因为一条鱼而葬送前程,机会成本太大,宁可不受。这种对话与探讨,对于大学生素质的提高,对智能、技能、处事之能、待人之能、正己之能的提升作用,当是不言自明的。

应当指出的是,《对话》一书,独辟蹊径,从现实与未来的发

展高度,从崭新的视角,来对传统与现实、司马迁与《史记》的多元功能价值、当代大学生的人文诠释与科学素养等焦点与热点问题关注,展开探究。这对于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教育改革的深化,无疑将是大有裨益的成功尝试。借此,发表一些个人的见解,望能抛砖而引出更多美玉。

一、传统与现实的辩证关系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珍视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与文明硕果,千万不能像西方或欧洲人那样,若干年之后,却到异国他乡去寻找自己的文化,去寻求那已经失落的世界的艺术珍品,而这一切本应属于自己。

“弘扬民族文化”,是一个发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一个发现与革新传统的问题。传统总有它的正面与负面。既有调节秩序、丰富思路、提供智慧的功能,也有因循守旧、妨碍开拓精神的消极性与惰性。

“传统”恰似一条宽阔的河流,它时时刻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在人们的心中流淌着,时而风平浪静,时而又与现实冲突而掀起波涛。我们不仅得承认它的存在,承认它的无比强大的潜在力量,而且更须用慧眼识其真金与正负效应兼具的真谛。否则,就会导致要么全部否定、一概抛弃;要么全部肯定、抱残守缺的悲剧发生。但是,弘扬又须回答:一是弘扬什么,二是怎样与如何弘扬这两个问题。

具体而论,传统是一种智慧的积累与结晶,又是一种可增值的智果,更是一笔可供借鉴、利用、开发的特殊财富。但智慧的价值,还须依靠智者的智能去激发,去碰撞,去开启,因此,用现代的眼光、科学的悟性之于传统,进行投射、透视、点化,则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可见,弘扬既是对弘扬者的一种挑战,一种

自我超越与升华,更是一种对科技智能、文化功底的实实在在的考验,来不得半点花枪与浅薄,舍此将会贻误今人,贻笑后世。

至于如何弘扬,这自然要因时而异、因人而别、因需而择,更须量力而行、量能而进、量智而取。就是说,不仅要与国情民情市情相通,而且更要与时代进步与变革的潮流相融。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更须不断创新,不断超越。

二、司马迁与《史记》的多元功能价值

司马迁的《史记》,既是文学形态的历史,又是历史内容的文学。其史书撰写的原则所体现出的,则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既能准确地观察、把握客观的历史世界,使《史记》成为史书的典范,同时,又将自己对历史世界的内心观照、时代思想与智慧的体察,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使读者洞悉其中的意蕴和奥秘,进而有所感悟,产生共鸣。

司马迁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敢于向命运挑战、勇于向人生奋争的向上精神,以及他身处逆境而志不移、心灵受辱而意更坚的高尚品格。进而,在坎坷中崛起,突出困厄重围而奋飞,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宏篇巨著,向后世馈赠了一座用自己内心深处伤痛处流淌的心血浇铸而成的智慧的丰碑。

人的一生,不可能任何时候都一帆风顺;生命历程中,更不会处处坦途顺畅,随时都要面临挑战,同时,还可能遇到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有时还会陷于危机与逆境之中。对于这一切,是回避,是消沉,是丧志,还是去迎战,去拼搏,去奋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作了很好的回答,他说: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

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可见,他对人生的诠释,对命运的衍化,对困厄这杯苦酒催生智慧奇果的独特功能效应的感悟,真可谓高屋建瓴,独树一帜。同时,这既是司马迁自身人格的写照,更是他对人生真谛的浓缩。

三、当代大学生的人文诠释与科学素养

当代大学生,今天是在校勤学苦读的莘莘学子,明天走向社会将成为肩负建设重任的栋梁之材。而对新世纪的种种挑战,面对新经济高科技时代的激烈竞争,全方位地培养大学生们的人文诠释能力与科学素养,便成为当务之急。这是因为,在校时,大学生们面对的是相对熟悉、合拍的校园、课堂、实验室、教师、同学、书本,而一旦跨入社会,迎面而来的则是择业的困惑、创业的艰辛、竞争的残酷与激烈、陌生环境的适应、所学专业与市场需求的重新定位,等等,均需有健全的人格和身心素养,尤须逐步读懂社会与人生这两部活书。而如果缺乏基本的人文诠释能力与科学素养,轻则遇事发生迷茫与困惑,而束手无策,重则偶遇挫折失败,便自暴自弃而消沉错位。

为了真正提高自身人文诠释能力与科学素养,当代大学生们从古今中外的典籍、名著、人生格言中,汲取丰富的养料,进而增强生存力与免疫力,增强活力、激情与创新力,当是上上之策。正如契诃夫所说:“人要有三个头脑:天生的一个头脑,从书本中得来的一个头脑,从生活中得来的一个头脑。”爱因斯坦也说过:“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现在,大家都为了

电冰箱、汽车、房子而奔波、追逐、竞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了。但是也还有不少人,他们不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他们追求理想和真理,得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应当说,《对话》一书,从形式到内容,则对此找到了一个最佳切入点。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对话》一书的作者廖曰文、陈峰、吕金海诸先生,他们虽不是专职研究人员,且都有繁忙的行政公务,但他们却从人文素质教育的角度研究了《史记》中的智慧,并在教学上进行了实践。这不仅在教学上开创了成功的先例,而且在将古代智慧成果如何“古为今用”、为提高当代大学生人文诠释能力与科学素质进行有效地探索,其探索本身及学术研究成果《对话》一书,便具有创新意义与学术价值。它的先导功能与重要作用,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来。

总之,本书的突出特点体现在其思辩价值上。古今智慧的确在这里进行了碰撞,并产生出了绚丽的火花。当然,书中的缺陷也在所难免,如学生的有些回答也有不周全之处,教师的个别点评也并非没有破绽,但这些微瑕无损于这本书稿所开创的研究视角对《史记》研究的价值。我相信,《智慧的碰撞》在与先哲对话的同时,也一定有助于解答当代人的某些困惑与迷茫。阅读它确是一次启迪智慧的“旅行”。因此,我很高兴为这本书写序,同时,我期待着这样的著作再多一些、更好一些。

林永匡

2001年6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史记》：史家之绝唱(代前言)

司马迁的一生都献给了《史记》。司马迁和《史记》已经融为一体。《史记》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学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文学名著，自成一家之言。这就是说司马迁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亦罕见的一位文化巨人，在整个世界古代史上也是一位罕见的天才。

一、司马迁的生年、出生地、壮游与出仕

1. 司马迁的生年

其一，生于公元前 145 年。司马迁当了五年太史令，汉武帝改元太初，颁布新历，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司马迁决定将《史记》的记事下限迄于太初。这一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的工作，故唐张守节的《正义》就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加按语说：

案：迁年四十二岁。

太初元年是公元前 104 年，迁年四十二，王国维据此推算，当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公元前 145 年。今大多赞成此说。

其二，生于公元前 135 年。《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称《自序》)写道，元封元年司马谈病死，“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唐司马贞的《索隐》在这一句下注云：